

从上海日商纱厂考察 战时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

王 萌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鉴于华中为法币之发祥地，也是英美经济利益集中之所在，日本采取与华北不同的货币战形式，秘密推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工作。^①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如何动员日本在华产业的经济资源，维持军票价值体系，成为日本面对的重要问题。其中，因上海日商纱厂实力雄厚、规模庞大，^② 尤受日本军政当局瞩目。以往学界对军票的研究，侧重揭露其对华中沦陷区金融的危害，而对“无根”的军票何以广泛流通，似未展开充分研究。有学者发现上海日商纱厂与华中军票存在联系，但因一手资料阙如，未能深入分析其中的复杂关系。^③ 笔者利用日本大阪棉业会馆新出日本在华棉纺织业档案，^④ 以上海日商纱厂与日本军政当局华中军票工作的结合为视角，探究纱厂居中扮演的角色，军票对纱厂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及其背后体现的日本民间海外资本与日本军政当局存在的利益纠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揭示中日战争前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货币战的本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日本在华企业与日本对华通货政策研究”（编号 13YJC770045）阶段性成果。业师华东师范大学易惠莉教授对初稿有诸多指正，日本京都大学笼谷直人教授为资料收集提供极大便利，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 ① 所谓“军票工作”，按日本军方定义，乃通过维持价值、扩大流通来实现并发挥军票货币功能的各种政策或措施（参见清水善俊：《支那事变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 29 卷，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71 年，第 29 頁）。本文所指的华中，按战时日本对中国区域的划分，概指日军控制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沦陷区，包括今天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市的全部或部分。
- ② 1937 年 6 月末，上海日商纱厂按设备折算的投资额约占日商纱厂整体投资额的 63.2%，是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生产力量。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日商纱厂虽蒙受战火折损，基本生产规模仍得以保存。（参见東亜研究所：《日本の対支投資》，東京：東亜研究所，1942 年，第 231 頁）
- ③ 关于军票的主要研究，参见陈建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 年；陈正卿：《日伪对华中沦陷区金融的掠夺与统制》，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桑野仁：《戦時通貨工作史論》，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5 年；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柴田善雅：《軍票と華中通貨工作》，中村政則等編：《戦時華中の物資動員と軍票》，東京：多賀出版，1994 年。其中陈正卿、柴田善雅等对日商纱厂参与军票工作的史实略有提及。
- ④ 2008 年笔者在日本大阪棉业会馆中发现一宗题为《重慶經濟封鎖と軍票經濟圏ノ確立、上海操短問題、〇〇少佐問題、埃及棉問題、在華紡績協力具体案》的档案，对本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简称为“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華紡档案”。

一、日本军政当局对纱厂利用策略的变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华货币战的序幕亦逐渐拉开。所谓“货币战”,按日本军方定义,即“维持日系货币价值与打倒敌性货币的经济作战”。在华北,日本的金融布局自1935年秋华北事变时已展开,1938年2月日伪设立“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与日元等值联系的“联银券”,将之作为华北沦陷区内驱逐法币流通的利器。而在华中,自淞沪会战以来,大量日币伴随日军侵略步伐流入上海、江浙一带。这些日币与日本国内日币在价值上出现差距,对日本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不利影响。^①日军企图将此货币危机转嫁于华,于1937年11月发行军票。^②此后,军票作为日军征发物资的工具,成为日本在华中开展货币战的经济武器。

军票作为日军战时出台的应急措施,日本政府并未对之投入任何担保,其名义虽与日币等值,但信用远不及日币,不能与日币随意兑换。军票发行初期只在日军与市面间循环,流通量仅数百万元。鉴于华中自战前即为国民政府金融、经济、贸易重心之所在,法币在华中的势力远较在华北的强大,日本军政当局认为,“比起掌握货币制度,先决问题在于掌握物资,作为外币获得的手段而考虑利用法币。当然这是特以华中为法币牢不可拔之地盘为前提的”。^③日本最初考虑要利用能够采购各种物资的法币,因此对华中沦陷区内日系货币(日币、军票等)与法币并存流通的局面持默认态度。

自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来,法币成为上海日商纱厂经济生活的基本货币,维持其各种生产活动。淞沪会战后,上海日商纱厂陆续复工。与“战时体制”下日本国内纱厂因原棉不足而大幅减产的萧条局面不同,^④上海日商纱厂依托“孤岛”开放的外汇市场与自由贸易环境,将手中法币换取外汇,采购生产所需的外棉,维持着旺盛的生产态势。1938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除个别月份外,纱厂保持近100%的生产率,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⑤

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上海日商纱厂这一生产动向,未加阻止。据日商纱厂业主回忆:“纱厂在华棉无法上市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外棉,担惊受怕地维持着生产,唯恐哪天突然被勒令停业。然而,因产品可以获取外币,我们得到放手生产的指令,从而进入了真正大生产的阶段,各家纱厂莫不如此。”^⑥日本政府对纱厂的态度,实则体现了日本战初对法币积极利用的立场。

1938年10月以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军票发行量的增加,维持军票价值工作逐渐受到日本重视。12月日本军政当局对上海金融市场采取迂回战术,宣布以军票统一除上海外的华中沦陷区内所有日系货币。此时军票已扩大流布于华中各地,日军所至,强制以军票支付各项货款,一些与日军存在业务往来的日商企业开始以军票进行交易,军票遂渗入华中日本企业之

① 日本學術振興會編:《支那の通貨と貿易》,東京:有斐閣,1942年,第29、35頁。

② 参见《沪分处为复调查日推行军用票情形代电》,1940年2月9日,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③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經濟の発展》,東京:東亜研究所,1944年,第500頁。

④ 参见飯島幡司:《日本紡績史》,大阪:創元社,1949年,第340頁。

⑤ 参见王子建:《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4页;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256—259頁。

⑥ 名和統一:《最近の支那紡績業に就いて(二)》,《大日本紡績連合会月報》第574号,1940年8月25日。

中。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充分利用华中日本企业的物资资源维持军票价值，并进一步扩大军票在华中各级市场的流通，成为日本军政当局尤为关心的问题。

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间，日军几度通告鼓励华中日商以军票交易。^①1939年初以来，上海日商纱厂流向汉口的棉产品主要供当地日军采购军用，日军虽强制销售棉产品的日商洋行接受军票，而洋行往往将军票设法换成日币或法币后，再与日商纱厂结算，因而流入纱厂的军票极有限。就使用情况来看，1939年1—5月间，纱厂以日系货币结算的物资采购额达1728.7万日元，其中军票91.9万日元，仅占约5.3%。^②5月末，纱厂实际保有军票仅36.3万日元左右。除与日军个别交易以军票进行外，纱厂与华商客帮的产品交易、劳工工资的支付，皆以法币结算。^③在日军的压力下，上海日商纱厂虽作出部分让步，各厂同意按纱锭枚数比例从洋行处收取一定数额军票，但对于吸收军票的态度并不积极。

1939年5月间，上海金融界发生两件大事：（1）日伪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与法币等值的“华兴券”；（2）沪上汇市日币价格出现暴跌。“华兴券”的出台，体现了日伪窃取法币贸易通货机能的意图，表明法币仍具有强大生命力；^④而后者，自1939年初起日币兑法币行情不断下跌，至5月跌至谷底，说明日元集团内货币体系的紊乱。^⑤这两件事在中国人看来，均反映了“日方苦闷的加重”，^⑥沪上《申报》据此分析日本国力因对华战争的大量消耗而削弱，日本将最终走向总崩溃的结局，^⑦引起日本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相马敏夫的高度警觉。^⑧

日本军政当局立即采取一系列维持日币价值稳定的措施，厉行物资统制的日军甚至允许“在华纱厂可将购入的外棉运往华北，而把当地等额的棉产品运来华中”。^⑨日币贬值风暴带动军票行情下落，一般军票较日币更低2—3元左右。汇市不利于日系货币的变动，迫使日本军政当局决定以非正常市场货币交易的方式，^⑩在控制日币跌势的同时，竭力提高军票价值，使两者价值不断接近，最终以军票替代日币与法币挂钩，彻底保证日币的安全与稳定。

“日币价值维持工作”与军票工作形成联系后，日本军政当局利用日商纱厂的思考角度发生了变化。有日本学者指出，军票价值的维持是通过“物资”与“货币”两种资源来实现的。^⑪军票发行之初，日军虽屡令纱厂以军票交易产品，但纱厂态度消极，效果甚微。以1939年5—6月间上海汇市日币暴跌为发端，国人对法币的信心剧增，“新的纸币已得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在日军占领地带仍有效的直接政策。它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货币的价值，超过日元

① 参见今村忠男：《军票论》，东京：东京商工行政社，1941年，第143页。

② 《第十四回会議報告》，1939年6月7日；《第十五回会議報告》，1939年6月14日，在华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會議錄》，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図書館蔵。

③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經濟の發展》，第236頁。

④ 参见纯真：《二年来的中日货币战》，《战时日本》第2卷第6期，1939年。

⑤ 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統・現代史資料11》），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年，第285頁。

⑥ 国民出版社編：《中日货币战》，金华：国民出版社，1939年，第27页。

⑦ 史亦闻：《最近上海日元跌价原因的分析》，《申报》（沪版）1939年5月22日，第14版。

⑧ 相馬敏夫在回忆录中特意记载了《申报》5月22日关于日币贬值之评论，可见触动颇深。（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4頁）日本在华棉纺织业档案中，大藏省财务官驻上海事务所书记官相馬敏夫的官衔被简称为“财务官”。本文也以此称谓。

⑨ 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6頁。

⑩ 参见宮下忠雄：《支那戦時通貨問題一斑》，東京：日本評論社，1943年，第247頁。

⑪ 参见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第51頁。

或是日本在沦陷区强逼发行的新币制”,^①而“货币为经济之枢纽,货币基础稳固者,即为经济力量充实之明证”。^②因而日本军政当局决心动员各种在华经济力量展开军票对法币的汇率战,以摧垮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上海日商纱厂手中庞大的货币资源遂纳入日本军政当局的视野。

二、“伊资金”的启动

作为应对日币暴跌之策,日本军政当局决定自1939年6月起,设立一系列秘密“资金”账户。这些“资金”账户从各种渠道吸聚货币资源,专供日方操控汇市,维持军票价值。举其要者,有1939年6月大藏省驻上海财务官劫留上海关税设立的“乙资金”;1940年1月日军以军费拨款设立的“吕资金”;同年7月日军利用“乙资金”利润设立的“丙资金”;1941年7月日军以军票与法币设立的“军票价值平衡资金”;而与上海日商纱厂利益关系密切者,有1939年6月设立的“伊资金”、1940年10月设立的“K资金”与同年12月设立的“C资金”。三者中,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最重要者,又属“伊资金”。

1939年6月初,日军通过与财务官相马敏夫协商,由其出面令日商纱厂自当月起按月向横浜正金银行一秘密账户提供300万元法币,日军给予纱厂相应时价的军票存款以作补偿。这一账户即所谓的“伊资金”。日本政府特别强调“在操作以上存款时,各厂绝不可卖出日币购入法币”、“当以军票存款向日本国内汇款,或买入日本国债,或转为定期存款时,就可支取,但绝不可用于诸如对军票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的支付用途”。经各厂协议,这笔资金由各厂按纱锭枚数比例上缴,其中内外棉纱厂承担金额最多,达70万元;而东华纱厂承担额最少,仅7万元。^③

作为利益交换,日本政府表示:(1)作为基本原则,纱厂今后每月实施的法币存款以其利润充当,当利润减少时,本案可再协商;(2)本案实施中,若遇金融梗塞等情况,纱厂可从银行获得短期融通资金;(3)本案实施中,军方原要求纱厂的合作事项全部撤回;(4)政府援助纱厂排除在获取原棉投产、产品交易上的阻碍;(5)本案由财务官与纱厂斡旋。以上诸条,以第(2)、(4)两条对纱厂最具诱惑力,日本政府以第(2)条打消纱厂对法币短缺的顾虑;第(4)条则明确表明日本政府默许纱厂以法币采购原棉等行为,为纱厂的全线投产提供基本保障。

“伊资金”启动后,日本军政当局意识到,日军若为采购法币物资通过正常汇市交易以军票换法币,势必导致军票价值下跌,而使“伊资金”的工作失去意义,故另规定:“日军及关系企业所必需的法币调度,绝不可通过市场自由兑换,而应利用本资金(‘伊资金’)来实现”。^④可见,“伊资金”又具有为日军调集物资采购所需法币的功能。

“伊资金”设立后,日商纱厂的缴款并不顺利。1939年夏,沪上棉货行情高涨,纱厂从产品交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由于纱厂一般将利润大半汇往日本,每月从中提取300万法币,并不会对生产造成影响。^⑤然而,1939年6月23日,恰在纱厂须将规定金额的法币首次存入“伊资

① 国民出版社编:《中日货币战》,第40页。

② 马寅初:《战时常识介绍:中日之货币战》,《进修》1939年第11期。

③ 清水善俊:《支那事变军票史》,《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第71—72、78、82、89—91页。1940年12月因振华纱厂加入上海日商纱厂集团,内外棉纱厂的责任额减至法币68万元。(参见《第五十二回会议报告》,1940年12月4日,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大阪本部:《在华纺织同业会通牒(上海)》,SI5—IV—13,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④ 清水善俊:《支那事变军票史》,《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第29卷,第89—90页。

⑤ 参见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第261页。

金”之际，重庆国民政府突令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实行法币存款限制提现政策，^①诸多商业交易陷入停顿，中外棉纺织业首当其冲。纱厂只得通过财务官相马敏夫与“华兴商业银行”协商获取融资，以解燃眉之急。^②

日本掌握大量法币后，上海汇市军票对法币的汇率战即告打响。7月初，法币对军票汇率居100元以上，汇市“法币贵、军票贱”格局并未改变。^③日商纱厂在法币短缺的情况下，仍按期向“伊资金”存入法币。7月中旬，因中英平准基金所供英镑告罄，国民政府放弃对黑市法币汇价的维持，上海汇市进入放任状态，法币行情由此狂跌。不久日本政府规定，自12月1日起禁止日币在上海地区流通，华中沦陷区内将推行军票“一元化”政策。^④军票成为华中唯一日系货币，法币兑军票汇率于75—78元间展开拉锯。1940年3月末，法币兑军票汇率回升至80元关口。此时，日本军政当局向纱厂提出6月缴纳法币700万元、7月缴纳900万元的要求，纱厂方面也予以满足。至8月，法币兑军票汇率跌至75元以下，行情彻底转向有利于军票的一面。^⑤

鉴于军票对法币的汇率战“告捷”，上海日商纱厂希望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⑥（简称“同业会”）与日军交涉暂停“伊资金”，并强调“只要利润充裕就考虑再次缴资，并保证一定以法币缴还”，^⑦考虑到“伊资金”与军方利益攸关，为避免军方猜忌，大阪总部否决了上海方面的请求。

1941年1月后，“伊资金”对于日本军政当局而言不仅在于维持军票价值，而是为1939年8月成立的“中支那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简称“军配组合”）提供法币。^⑧1942年汪伪发行“中储券”，日本军政当局原则上同意纱厂以之代替法币上缴“伊资金”，暗中平衡“中储券”与军票的兑换汇率。1943年初，“中储券”在华中沦陷区内基本取代军票，“伊资金”再无存在价值，遂于3月关闭。

据同业会档案，至1940年12月末纱厂共存入“伊资金”法币6407.4万元，转成军票存款达4713.7万元，约占同期华中军票流通总额的47%。^⑨这些军票陆续以国债、存款、捐款等回流至日本军政当局手中，一部分以工资、货款等流入沦陷区内。若仅从关涉金额数的庞大程度来看，日军方称“（该资金）对1940年秋为止军票渡过困难时代给予了极大贡献，乃是应在军票史上大书特书之事”，并非溢美之辞。

三、“K 资金”的设立

1939年12月日本政府推行华中军票“一元化”政策，军票功能已不局限于现地日军的军费

① 参见《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密件》，1939年6月22日，《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1939年1月—12月通函》，S173—1—443，上海档案馆藏。

② 参见《第二十一回會議報告》，1939年7月17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上海支部：《上海會議錄》，日本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③ 参见相馬敏夫：《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89—290頁。

④ 清水善俊：《支那事變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9卷，第148頁。

⑤ 今村忠男：《軍票論》，第125頁。

⑥ 所谓“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系日商纱厂于1925年成立的同盟性质的行业协会，除大阪本部外，下辖上海、天津、青岛、东京等支部。

⑦ 《紡績操短ニ関スル件一十七日上海支部ヨリ來電（至急暗号）》，1940年9月17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⑧ 参见中村政則等編：《戰時華中の物資動員と軍票》，第106—107頁。

⑨ 《伊資金計算日報》，1940年12月28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線（上海）》，S15—IV—13，日本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征发,而成为在华日人各种经济活动的基本货币。^①至1940年2月,“沪上军票每日的成交数额自一百数十万元至二百万元左右。四川路一带之钱庄,大都兼营军票买卖……解交日商货款,至水路运费暨火车轮船客票,均需军用票购买”。^②军票在一定区域内已具备商业货币功能。

由于军票自身购买力提高,如财务官相马敏夫所指出的,日商纱厂虽反对将所有产品以军票售出,但“如今也需出于成本考虑,渐至实现以军票交易的层面,若这一层面达到相当程度,以军票进行交易当无任何异议”;^③同时,纱厂也不得不增加产品的军票交易数额以满足日军的要求。^④以1940年为例,12月纱厂的军票收入与1月纱厂的军票销售额相比,增长近10倍。^⑤据同业会估算,1939年1月至1940年7月间,纱厂累计消费上海进口外棉总量的80%,达544万担(平均200元/担),支出法币超过10.8亿元。^⑥纱厂原本售出产品以获取法币资金,然而随着军票交易量急剧增加,流入纱厂的法币相应减少,纱厂的外棉采购受到不利影响。

1940年9月军票在汇市确立对法币优势地位,若继续与法币挂钩,日本将面临军票过度升值导致法币过度贬值的问题。一方面,军票价值高涨导致各种日本进口产品价格飙升,制约日货销路的扩张,引起日商不满;^⑦另一方面,法币价值过低引发沦陷区内物价腾贵,不仅使日军套购物资不便,而且波及实行低物价政策的日本国内经济体系。^⑧日方考虑利用纱厂的军票设立一新“资金”账户,它与“伊资金”运作原理相反,即由该账户适度向市场抛出军票来平抑其急剧升值,间接使法币不至过度跌落而成无用的废纸。这一新设“资金”账户,即为“K资金”。

“K资金”设立的最主要目的为平衡军票兑换法币比值,并非对纱厂的特殊“照顾”。然而日方为避免“纱厂为筹集采购原棉的法币而利用市场渠道,对军票工作造成恶劣影响”而采取的这一措施,^⑨使纱厂间接获得一笔法币“专项资金”。1940年8月,为控制原棉流入纱厂数量,华中日军出台《棉花搬运出入许可处理要领》,规定纱厂“绝不可采购占领地外的棉花(海外进口者除外)”,且“每月必须汇报所有采购棉花的种类、数量、价格、来源、转卖对象及消费状况”。^⑩“K资金”与该要领的结合,使日本军政当局掌握纱厂采购原棉的数量,完全控制了纱厂的生产命脉。

“K资金”中的法币,主要来自军票与“丙资金”、“吕资金”、“乙资金”、“军票价值平衡资金”等“资金”间的互换。当军票行情高涨时,各“资金”均出现法币过剩而军票不足的现象,“K资金”的运作为它们起到回拢军票的功效。1940年10月,上海日商纱厂首次存入“K资金”

① 清水善俊:《支那事变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9卷,第89、156頁。

② 《敌在沪粤推行军票扰乱金融情形》,1940年2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傀儡组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29—1130頁。

③ 相馬敏夫:《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多田井喜生編:《占領地通貨工作》,第292頁。

④ 《第六十四回會議報告》,1940年3月18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線(上海)》,S15—I—10,日本大阪大学附屬図書館蔵。

⑤ 参见清水善俊:《支那事变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9卷,第184頁。

⑥ 参见《在華紡ノ立場ニ就テ》,1940年10月,“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華紡档案”。

⑦ 参见杉村広蔵:《支那・上海經濟の諸相》,東京:岩波書店,1942年,第5、31頁。

⑧ 参见宮下忠雄:《支那戦時通貨問題一斑》,第248頁。

⑨ 清水善俊:《支那事变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29卷,第98—99頁。

⑩ 《棉花搬出入許可取扱要領》,1940年8月24日,“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華紡档案”。

军票 193 万元,^① 至 1941 年春每月升至 700 万元, 此后各月上缴数百万元不等, 完全视日本军政当局需要而定。据日本学者大竹慎一推算, 1940 年 9 月至 1941 年 3 月间, 日方向市场投放约 3000 万军票,^② 这些军票极可能来自“K 资金”。

1941 年后, 纱厂流入华中沦陷区内的绝大部分产品均以军票结算, 军票不断流入纱厂内, “K 资金”从未遇到军票短缺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外棉进口基本断绝, 纱厂的法币需求降至开战以来最低点。1942 年 3 月日本军政当局出台《华中通货暂定处理纲要》, 视法币为“敌性货币”, 决定将之彻底打倒, 军票也渐为“中储券”所取代, 同年 6 月“K 资金”停止运作。

“K 资金”为军票工作中重要一环, 它与“伊资金”的配合为军票的流通提供极大便利。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几种货币的循环, 稳定军票而不使之居于过高位, 打击法币而不使之暴跌。据统计, “K 资金”自设立以来, 日商纱厂共投入约 8200 万元军票。日本军方认为, 该资金“打消了纱厂对采购原棉所需法币的不安, 有利于产品军票交易来援助军票工作的开展, 同时也为丙、吕等军票价值维持资金提供一强大军票来源, 对于军票价值维持工作可谓毫无遗憾”, 对“K 资金”的作用加以肯定。

四、“C 资金”的出台

“伊资金”启动后, 大量军票流入日商纱厂。随着军票升值, 纱厂与日军的矛盾逐渐显现。1940 年 7 月,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向日本政府提议以法令强制包括日商纱厂在内的所有华中日企向日军提供法币, 称“若仅从高层指导而非法令强制的手段, 大概已难有更大期待”。^③ 由于军票行情看好, 日军中流传纱厂利用“伊资金”大获其利的传闻, 透露出日军对纱厂课以重税的意图。^④

当纱厂与日军关系变得棘手时, 作为日本政府在华代表——大藏省财务官的斡旋就极为重要。相马敏夫“询问纱厂方面能否再提供一笔含有税金意义的法币”, 纱厂方面爽快地听从了这一要求。^⑤

日商纱厂的合作态度令相马敏夫印象深刻。1940 年秋以来,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 9 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 日本对英美关系骤然紧张; 上海汇市波谲云诡, 军票虽在价值上取得优势, 但相马深感仅仅依靠“伊资金”或将难以应对非常之变。他与日商纱厂的接洽正值纱厂受军方指责之际, 因而受到纱厂欢迎。当时同业会拟出三套协助相马的方案, 具体内容及理由如下。

1. 第一方案: 以月額军票 150 万元作为税款, 各厂按纱锭枚数比例分担, 该税款或作为捐款或购买国债, 由各厂自由决定, 可从税款负担额中扣除。理由: 纱厂利用低汇率汇款获利受到日本国民指责, 必须作一正面回应。

2. 第二方案: 同业会强化对各厂资金的管理, 将多余资金全部供日本使用。理由: 在日本

① 《第四十七回会議報告》, 1940 年 11 月 12 日, 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 《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線(上海)》, S15-IV-13, 日本大阪大学附屬図書館蔵。

② 参见大竹慎一: 《日中通貨戦史——旧植民地通貨金融研究》, 東京: フォレスト出版, 2000 年, 第 53—55 頁。

③ 清水善俊: 《支那事变軍票史》, 《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 29 卷, 第 98—99、188 頁。

④ 《軍当局トノ会談ニ付テ(報告)》, 1940 年 9 月 24 日, “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華紡档案”。

⑤ 相馬敏夫: 《中支那通貨工作の回顧》, 多田井喜生編: 《占領地通貨工作》, 第 300 頁。

国内企业“只要今后利润多余，即全部用来购买国债”的趋势下，在华纱厂也必须要有与之保持一致的觉悟；对纱厂而言，这也是安全之举。

3. 第三方案：设立与“伊资金”并行的另一用途“某资金”。（1）每月缴入一定金额（法币）。（2）该资金交由财政官处置。（3）以国债形式接受返还。（4）当纱厂遇到金融堵塞时，在财务官认可范围内，从该“资金”获取借款，并可以该资金为担保向银行借款。（5）该资金的运作仅限与同业会上海支部相关。理由：“伊资金”完全为军方支配，财务官在金融工作上无法使用。新“资金”将成为财务官的专用资金。^①

从同业会档案可见，当时各家纱厂对这三套方案意见不一。内外棉纱厂更倾向第二方案；大康、同兴、日华、上海、东华、裕丰等纱厂赞成第三方案；公大、丰田纱厂则对个案持保留态度。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日商纱厂赞成第三方案，即设立一专供财务官使用的新“资金”账户。这一方案不久成为纱厂协助相马敏夫计划的核心，也即“C资金”的雏形。

从所附理由中可进一步了解日商的复杂心态。第一、二方案在现实中能否实施均成问题。第一方案中，日商纱厂希望按月缴纳固定税款，缓和来自日本国内的批评。作为跨国企业的日商纱厂，在税金缴纳上无法与日本国内税法接轨，缴税在程序上无法操作。在第二方案中，同业会将一切剩余利润上缴日本当局，虽然表明了对日本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全力支持，但承受损失极大，必然遭致大部分纱厂的反对。第三方案，纱厂以新“资金”而非税款名义资助财务官，本质上虽与第一方案并无差异，但该方案迎合了财务官的意图，另有一层博取其好感的用意。

纱厂内部也曾考虑直接向日军妥协，拟定四套方案，后因相马方案（第三方案）的出台而放弃。^②就对军方还是政府让步，纱厂似有一番揣摩。两者的差别在于，军方方案将以军票上缴；而相马方案则以法币上缴。当1940年10月法币兑军票汇率仅为60元左右，其价值远低于军票时，军票缴纳对纱厂更不利。虽然任一方案都意味纱厂将蒙受巨大损失，然而纱厂内部通过反复权衡，最终将“投资”的砝码押置于日本政府系统下的财政官手中。

相马敏夫与纱厂、军方反复协商后，名为“C资金”的秘密账户出笼，纱厂自愿提供1000万元法币作为维持军票价值的储备金。这笔资金由日商纱厂自1940年12月起分五个月存入横滨正金银行。纱厂商定，期满之后该资金除部分购买日本国债及财务清理外，其余皆归财务官自由支配。^③

“C资金”的功能主要在于辅助“伊资金”。至1941年2月，法币大幅贬值，沪上金融投机严重，日商纱厂在向财务官作出“一旦日后需要，无论何时都可再次提供一千万”的承诺后，取回已存入“C资金”的600万元法币。鉴于军票价值稳定工作已告成功，相马敏夫同意此笔资金返还纱厂，“C资金”仅维持三个月即告中止。

“C资金”名义上归财务官支配，但一经启动，法币最终流入日军手中，日军仍是“C资金”受益者。“C资金”不过是纱厂谋求妥协的一种方式。^④它是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利益博弈的产物，暴露出日商与军方的矛盾：在日军眼中，纱厂始终是牟取暴利、不顾国家利益的资本集团；而

① 《在华紡ノ協力具体案ニ関スル代表者会議ノ件》，1940年11月2日，“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华紡档案”。

② 1940年10月，同业会另拟过四套提交军方的方案，这些方案主要围绕“伊资金”中的军票处置问题。（参见《重ネテ〇〇少佐トノ会談ニ就イテ》，1940年10月6日，“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华紡档案”。

③ 《呂資金案（即“C資金”——筆者注）ニ就テ》，1940年12月7日，“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华紡档案”。日本军政当局在1940年1月便已设立名为“吕资金”的秘密账户，日商纱厂对此并不知情。

④ 参见《影山少佐問題ニ付テ》，1940年10月17日，“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华紡档案”。

在日商眼中，军方则是不择手段掠夺的无饜敲诈者。两者关系紧张的背后，不仅存在日商与日军利益的紧张冲突，而且还有两者观念上——自由资本主义与经济统制主义的本质对立。^①

“C 资金”的中止并不意味着日军对纱厂的索求得到满足，日军另以节约军费为名令纱厂提供超过 10% 的利润作为国防捐款，并要求纱厂购买战争国债，为当地日军提供军费。^② 这些要求使纱厂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获取的利润大量流入日军手中。

五、日军“军票经济圈”的推行与日商纱厂的困境

1940 年秋，中日战争步入第四个年头。日本在战争中越陷越深，国内经济日益恶化。^③ 而在华中沦陷区，自 1939 年 12 月军票取代日币成为唯一日系货币后，军票流通区域不断扩大，价值大大增强。1940 年 5 月，日本对流入西南国统区的物资渠道展开封锁战，日本经济界注意到军票工作的新动向，“最近军票维持政策将倾力于对消费层面的引导与对生产层面的扩大，故必须对当地企业及营业部门再调整。当下确立现地战争经济体制乃必然之要求”。^④ 1940 年秋，日军认为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所谓“军票经济圈”的时机已到来。“军票经济圈”的确立，目的在于打击和排斥法币在华中的流通，限制或隔绝沦陷区内各种“援蒋利敌”物资流入国统区。^⑤ 对日本而言，“军票经济圈”的推行，是军票在华中市场上对法币优势地位的挑战，是通过物资统制来削弱国民政府抗战力的战略措施。由于物资交易过程也是货币流通的过程，物资战与汇率战一样，本质上都是货币战的表现形式。

1938—1941 年间，各种生产或进口物资通过上海租界渠道流入国统区，上海成为支撑重庆政权的重要物资源头之一。以棉产品为例，1939 年国统区内全年所需棉纱布的六成由上海供给，上海棉产品成为日本对重庆进行经济封锁战的重要对象。^⑥ 据日方调查，当时日商纱厂产品销路，“一部分经由日商以现金直接转售于华人批发商，与华商、英商纱厂产品同为上海本地消化。另一部分或经扬子江流入内地，或经蚌埠流入河南、江苏，或经温州、福州、厦门等地流入福建、江西，甚而经由法属印度支那流入西南”。^⑦ 由于华中沦陷区与西南国统区均为上海日商纱厂重要销路，纱厂陷入微妙立场：一方面，其产品流入沦陷区内，不仅消耗国民政府在外法币资金，且对于扩大军票流通“非常有效”；^⑧ 而另一方面，其产品大量流入国统区，充实了国民政府的抗战物资基础。日军当然认识到此中利害，自 1940 年 9 月起将日商纱厂产品定性为“限制运出物资”，但未将其销路彻底禁绝。^⑨

① 面对战时日本经济的难局，军部中相当数量的军官批判资本主义、支持统制经济。（参见中村隆英：《昭和經濟史》，東京：岩波書店，1986 年，第 104—105 頁）

② 清水善俊：《支那事变軍票史》，《日本金融史資料・昭和篇》第 29 卷，第 198、202 頁。

③ 参见白井勝美：《日中戦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 年，第 114 頁。

④ 《法幣顛落と当面の我が政策》，《日本工業新聞》1940 年 5 月 9 日。

⑤ 参见《重慶經濟封鎖と軍票經濟圈ノ確立ニ付イテ》，1940 年 9 月 2 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档案”。

⑥ 《重慶經濟封鎖と軍票經濟圈ノ確立ニ付イテ》，1940 年 9 月 2 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档案”。

⑦ 《在支紡の操短》上，《大阪毎日新聞》（夕刊）1940 年 9 月 18 日。

⑧ 《敌议会中之战地经济问题》，1940 年 8 月 10 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 1222 页。

⑨ 《佐佐木委員長ヨリ着電》，1940 年 9 月 8 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档案”。

1940年8月末,在日军监督下,“华中棉纱布销售协议会”成立,该会规定上海日商纱厂每月只能以军票向华中沦陷区内销售9000包棉纱。^①1940年8月上海日商纱厂棉产品军票销售数额为427.6万元,而9月骤升至908.2万元,表明纱厂销路的急剧“军票化”。同年,对于劳工工资的军票支付问题,纱厂虽经日军多次催促,最初以“惟恐引起军票价值低落”、“担心导致工人罢工”为由推脱,^②但自11月起,为配合日军出台大米必须以军票购买之规定,纱厂主动宣布劳工工资的三成以军票发放。^③大米交易历来受到日伪严厉统制,纱厂的决定不仅表明其对军票工作的有力支持,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内部经济生活的高度“军票化”。

日商纱厂的“军票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中外纺织业也出现使用军票的倾向。同业会上海支部理事堤孝认为,日商纱厂即使在断绝与西南物资交流、生产遭受重创之际,只要“彻底执行不以军票交易即不向市场放出货物之策略,中外商人也会因无货可购而软化屈从”。^④战事爆发后,日商纱厂的产品作为原料大量供给租界内大小中外纺织企业。正因看到中外纺织业间存在竞争且共生的关系,堤孝才会认为,日商纱厂在市场利益上暂时的牺牲,可以迫使租界内中外纺织业向军票屈服。不久日商的策略取得了成效,1940年11月上海法租界工董局开始以军票采购日商产品,表明租界当局对军票的态度出现松动。^⑤

不过,日军中部分将校认为,与其竭力控制棉产品的流动,不如直接关闭作为生产源头的日商纱厂最为便捷。^⑥对此,同业会辩称,“若按当局意志将纱厂全部关闭,虽应立即处理,然此举对上海市场影响极大,将导致何种事态,尚属难料”。^⑦为避免损失最大化,同业会决定:上海日商纱厂在7月末已实施自由减产三成的基础上,自11月起全体统一减产五成。^⑧大阪总部特意向上海支部说明了此次大减产的理由:“减产五成对于工厂经营者而言,乃极重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按军方意图在实质性政策上的实践,不如说如上电文所指出的,乃通过使众人皆明白的方式表明态度。”^⑨同业会高层的态度意味着,减产是为表明自身政治立场的必要手段。

这一决定成为上海日商纱厂战时生产轨迹的转折。减产的后果,纱厂自10月1日起停止周末作业,机器停转37%,11月起取消夜班,短期内还将解雇2万名工人。^⑩自1940年秋统一减产起,纱厂的生产能力一蹶不振,1941年纱厂棉纱产量较1940年下滑61.1%,宣告战时环境下其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⑪

然而,纱厂担忧的是,虽然日军一味叫嚣推行“军票经济圈”,但日本的货币政策并不坚

① 《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年報》(1940),上海:上海商工会議所,1941年,第68頁。

② 参见《工銀一部軍票使用方法連合協議會報告》,1940年1月23日,在華日本紡績同業会大阪本部:《在華紡績同業会通牒錄(上海)》,S15—I—10,日本大阪大学附屬圖書館藏。

③ 《工銀軍票払問題ニ関スル會議報告送附ノ件》,1940年11月8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④ 《軍票建販売は可能,在華紡堤氏決意を語る》,《上海支部來電》,1940年9月25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⑤ 《上海仏租界軍票を容認》,《大阪毎日新聞》1940年11月2日。

⑥ 《軍當局トノ會談ニ付テ(報告)》,1940年9月24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⑦ 《佐佐木委員長ヨリ着電》,1940年9月8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⑧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經濟の發展》,第237頁。

⑨ 《操短拡張問題》,1940年9月20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⑩ 《佐々木委員長宛發電(全部暗号)》,1940年9月24日,“棉業会館藏未刊戰時在華紡檔案”。

⑪ 《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年報》(1941),上海:上海商工会議所,1942年,第69頁。

定。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欲组建“中央银行”，^①不希望军票继续存在。^②日本军政当局关于在华中是否发行新货币也有过激烈争论，军方认为军票工作已取得一定成功，要求维持现状；而以“兴亚院”与大藏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主张避免使用军票，应扶植新“中央银行”发行新币来统一华中货币体系。^③作为日本政府、军方、汪伪利益折冲的结果，汪伪虽收回“华兴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但其“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币将与军票、法币共同流通，远未实现一统币制的期望。^④日商纱厂对未来局势感到忧虑，预见到法币与军票终将为新币所取代的命运。^⑤旧币迅速为新币所更替，并不受经济规律与市场法则制约，而为强势的政治权力所决定，常年积累的财富或因货币本位的变动而蒸发，这是纱厂恐慌的根源所在。

六、结 语

从货币原理而言，与依靠外汇保值的法币不同，军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⑥伴随发行量增加，若无相应物资担保，将导致购买力跌落。“军配组合”作为维持军票价值的物资统制机构，其业务即从日本进口各种物资，为回收军票服务。^⑦然而“军配组合”不能获取外汇，“不仅反映出（日本国内产品）向日元区出口存在的调整问题”，^⑧且“从（日本）内地来看，保证解决事变的物资量也未必能期望随军票增加而增加”。^⑨对日本而言，最理想的“军票交换用物资”，乃现地日本企业产品，其中上海日商纱厂的产品，是日本最直接可用于担保军票价值的筹码。为节约军费，中日战争前期日本比较注意对华中军票流通量的控制，其对手——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华中的数量却与日俱增，以1940年下半年为例，军票的流通量在1亿左右，而法币则达30—40亿之巨。^⑩为维持军票价值，对法币展开攻势，日本军政当局对日商纱厂的索取，实则体现了日本在经济持久战状态下国力的局限与物资动员能力的窘迫。

以1939年5、6月间上海汇市日币暴跌为发端，日方以军票为武器的货币战以汇率战与物资战两条线索展开：汇率战中，日商纱厂与“伊资金”等秘密账户的结合，使日本在关键节点得以征调充足的货币资源投放汇市，起到提升和维持军票价值的效果；而在物资战中，纱厂产品作为日军推行“军票经济圈”的工具，为军票在华中内地的扩张服务。日商纱厂在日本的华中军票工作中扮演了隐秘协助者角色。

然而，日商纱厂在经济活动中对法币与军票的抉择，始终陷入两难境地。“伊资金”的启动乃其被纳入军票工作的肇始，“K资金”与“C资金”的运作使两者关系更为密切。“军票经济

① 参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册，1940年10月24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69页。

② 《伪中央银行进行近况》，1940年7月22日，《中国银行总处关于敌寇与汪伪发行军用票及伪造法币强迫使用情报的通函》，Q54—3—162，上海档案馆藏。

③ 参见浅田乔二等：《1937—1945年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愈姪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④ 参见特种经济调查处编：《伪中债券之分析》（油印本），[出版地不详]，1941年，上海图书馆藏，无页码。

⑤ 《在华紡ノ立場ニ就テ》，1940年10月，“棉業会館蔵未刊戦時在华紡档案”。

⑥ 忆非：《日军票腾涨之观察》，《中报周刊》1940年第29期。

⑦ 参见柴田善雅：《占领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99年，第327—328頁。

⑧ 《新支那安定通貨の再建》，《大阪毎日新聞》1940年4月11日。

⑨ 《通貨問題（三）：新生支那を視る》，《大阪朝日新聞》1940年5月18日。

⑩ 参见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經濟の發展》，第514頁。

圈”的推行使纱厂急剧“军票化”。结果，军票工作使纱厂自战前以来形成的法币体系受到严重破坏，战时旺盛的生产之势一蹶不振。不过，应当看清纱厂作为“受害者”的本质，乃是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短期经济利益屈服于日本长期统制策略的必然结果。

在维护“国益”的口号下，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围绕军票工作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与博弈关系。日商纱厂在利益上的“割舍”，根本目的在于换取日军对其战时大规模生产棉产品之类“非军需物资”的谅解；日军对军票的热衷，因军票与其现地切身利益关联；日本政府注重日本在华长远利益，更多考虑军票与沦陷区内日本统制经济的整体结合。战时日商纱厂对华商纱厂资产的侵夺、对劳工运动的制压、对沦陷区内棉货市场的垄断，皆赖日军的武力庇护与日本政府的经济统制而实现。^①作为日本侵略的既得利益者，纱厂对于日本制定的各种货币战策略，虽有怨诉，但在行动上仍自觉服从，体现了其所代表的日本海外民间资本对军政当局依附与软弱的性格。

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实效如何？1940年10月后军票工作表面取得成功，然而军票流通仅局限于华中大城市与主要铁路沿线地带，农村仍是法币天下。^②在民间资本眼中，军票是较“华兴券”等伪券稍稳定的投机对象，“在日元势力区域内之各种杂币，似乎以日本军用票比较其他为稳定。不过其稳定之范围，可能保证者，乃一时尚不致降低于法币之等值而已”。^③军票与日元集团其他成员——“蒙疆券”、“联银券”等存在同样致命缺陷，即虽都宣称与日币等值，但实际购买力均低于日本国内的日币，且都不具备直接与英镑、美元兑换的功能。^④日本竭力对军票、伪券价值加以维持，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它们的对外价值及有限商业货币机能，乃依赖法币而生，军票虽能在沦陷区内部分区域对法币流通有所打击，但绝无建立“独立王国”可能；作为负效应，1940年后“法币经济圈”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样波及“军票经济圈”，造成日伪对沦陷区内物资收购的困难。^⑤1941年1月汪伪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日本并未按一贯货币政策立即将之纳入日元集团，而设法币等值，系因“新法币（即‘中储券’——笔者注）与军票不同，故可购买外国商品，又因中央储备银行有充分发行准备，能发行多额钞票”，“如以此新法币确立华中之货币制度，将来或进而统一全中国之货币制度，亦决非不可能之事”。^⑥显然，日本寄望于“中储券”补完军票的缺陷，实现华中金融体系的再统一。

和平时代的货币战争，主要以操控汇率方式于贸易战场展开，谋求国际收支的改善；而战时的货币战争，以中日战争时期为例，形态更诡谲多变，后果更残酷。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形成极密切的联系，日本对华投资甚巨，战时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以其最强大的民间海外资本——日商纱厂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说明日本在华中的货币战具有双刃剑性质，在加祸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同时，对其自身海外产业也造成相当不利影响。

〔作者王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战时日商纱厂对华商纱厂的侵占与掠夺，参见柴田善雅：《中国占领地日系企業の活動》，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年，第162—177頁。

② 邱宝鸿：《货币战现阶段与法币对策应有的改变》，《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

③ 《中国“货币战争”之各面观》，《经济丛报》第2卷第26期，1940年。

④ 日本銀行編：《今後ニ於ケル中支通貨政策ノ方向私見》，東京：日本銀行，1941年，無頁碼。

⑤ 東亜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經濟の發展》，第516頁。

⑥ 宮下忠雄：《日本在中国之货币战》，《译丛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